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化创意

□魏 红

一款“ 朕知道了 ”的胶带纸，今夏意外风靡两岸四地，掀起一股台北故宫的新热潮。作为台北故宫首推的皇帝朱批纸胶带，该文创品取自博物院典藏康熙真迹，创意设计简单明了又霸气十足。以黄白红三色为一组，售价 200 元新台币，让众亲诸粉大呼过瘾，直赞“ 故宫文物不再不能亲近 ”。该品秉持“ 以故宫典藏为源 ”的博物院文创原则，又一反皇家严肃端庄的传统印象，依托亲民产品的日常亲和，并借助故宫网络商城，特别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收藏热潮和网络热议，所到之处开启想象欢乐无限，堪称华语圈的一大文化事件。

该系列胶带纸目前已有五款上市，除了“ 朕知道了 ”，还包括“ 乾隆御览之宝 ”“ 宫院藏印章 ”“ 青铜器图纹 ”“ 金文 ”等，台北故宫还将陆续推出 20 款。展区内外网络上下，从网购、团购、代购、预购到故宫精品粉丝群建立，从文博工作者的公益参与和设计领域的专业批评，到民众对相关文博知识学习和对朱批奏折展的内容回溯，这次大众对“ 朕知道了 ”的热烈反应出乎各方意料。这款胶带与馆藏文物结合的文创设计，典出渊源、构思精巧、现代时尚又充满草根气息，让见闻者忍俊、创作者会心。

一款小小的文创作品，千锤百炼后惊艳亮相，其背后凝结的是文博文创团队的持续研发，更是博物院建院以来使命传续的集体爆发。

台北故宫近些年推出了 2400 多种的文创产品，产品年收入达到 8 亿新台币，这背后是确实的历史依据、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开放的创意设计，以及多领域专业人士同心协力，文脉相续、薪火相传的真心诚意，还有博物院经年发展所形成的战略体系与发展理念。作为台湾最为骄傲的文化资产，博物院积极顺应世界范围内的博物馆运营转型和价值功能拓展，回应“ 台湾设计 ”和“ 智慧台湾 ”的总体目标，除了保持文博专业研究的传统优势外，还专项谋划文创发展，以面对事业竞争和永续经营的挑战。在“ 数位故宫 ”“ 智慧创意故宫 ”“ 大故宫 ”等战略规划推进下，台北故宫博物院已日渐形成文创领域的三大社会品牌，即基于 69 万件精良藏品的文化教育品牌、基于文创能力培养的人才开发品牌，以及基于当代设计产业的合作营销品牌。

其中，文创人才是台北故宫文创产业的核心要素。博物院没有专门的文创团队，通过竞赛向社会公开征集典藏衍生文创提案，收集文创产业发展研习成果，这是博物院目前获得文创初选的两种主要途径。因此，博物院面向社会开发了系列项目，旨在熏陶、培养和提升相关人士及团队的文创素养和能力。特别是“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习营 ”，自 2009 年起以团队为主要对象，以故宫典藏文物为基点，每年定期开展文创专业培训，形成一批实质设计成果，并建立博物院与文创产业之间的合作及营销模式。

正如院长冯明珠所言，博物馆不能远离观众，博物馆要做到与人亲近，要靠能与人们亲近的活动。如针对文创领域及人士，博物院策展时于 2010 年先期推出衍生文创商品设计竞赛，进行特展预热和推介。为了提升设计品质，在一个多月的征件期间，博物院特别为参赛者举办了国宝 100 之美学解析讲座、设计创想营等专业支撑，以增进参赛者对院藏文物内涵及创意化潜力的理解。

就是在这次竞赛中，两位设计专业的在读研究生提交的“ 古纹胶带 ”和一位 16 岁高二女生设计的“ 翠玉白菜伞 ”脱颖而出，成为博物院的创意来源。而与青年设计者密切合作已经成为台北故宫文创的积极经验。以资深设计的专业眼光看，这些作品单薄稚嫩不够完美，但因突破了传统纪念品的千篇一律，少了呆板沉闷和潦草应付，特别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和关注。“ 衍生品是博物馆知识消费的延伸 ”。从典藏珍品的特质中，吸引年轻受众参观博物馆、参与到博物馆工作，成为个人精神生活、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构成，在这一当前博物馆生存的主攻方向和社会影响上，台北故宫实实在在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关于台北故宫，有部纪录片一再被提起。这就是博物院与国家地理频道携手，于 2007 年推出的“ 透视内幕：‘ 国立 ’故宫博物院 ”。该片通过 34 种语言在 166 国电视频道播出，透过国际宣传平台，带领全球观众一窥中华瑰宝，了解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传统与再造，与世人分享这座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宝库。影片制作精良，感官印象深刻。其中有片段介绍清乾隆宫廷技师陈祖章所雕的核舟：榄核长不盈寸刻而成舟，八位人物须眉毕见，箬蓬花窗、桌椅煨炉、杯盘菜肴等，以及刻于舟底的《后赤壁赋》全文，不可思议地以高清呈现，精巧绝伦，一枚细榄妙化仙舟，年少习读《核舟记》时的惊愕恍若在前，令人回味向往。该纪录片作为台北故宫藏品数字化的项目成果，荣获了多个国际奖项。

作为国际级博物馆，台北故宫在文博研究、专业展览、教育推广、文创发展、观众服务等方面的作为有目共睹、精彩可期。“ 工程可以使一个城市变大，但只有文化才能使一个城市变伟大。 ”从馆藏珍品到文创产品、商品，再到平民藏品，从典藏特展到文创竞赛，再到互动参与，让诸般禁脔走入寻常百姓，特别是唤起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品味，博物院对各环节进行精心设计、细致推敲和深度发掘。近期，博物院在台湾各地举办“ 故宫潮：当国宝遇上设计 ”巡回展，引发广泛回响。这是院方尝试走向民间，走向民众的一种努力。而“ 朕知道了 ”的热力仍在持续发酵，随着特展进入地方，目前正变身为好吃的小蛋糕出现在教养学校，尽显博物馆文化的濡化风采、涵化功能及感化力量，传承历史、启发未来。

文化视野

慈悲的力量

□车 耳

慈悲这个词应该出自宗教语言，慈指的是用爱护心给予众生以安乐；悲指的是用怜悯心解除众生的痛苦。所谓“ 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 ”进一步讲，慈悲心是形容人心肠善良态度慈和之意，俗话讲就是心肠好。慈悲的近义词有和善、慈爱、体恤和宽容，它的反义词则是冷酷和残忍。

慈悲不完全和同情划等号，慈悲与同情最大的区别可能是：因为恐惧而怜悯是同情，因为爱而怜悯是慈悲。

古今中外，无论是谦谦君子还是江湖义气，无论绅士风度还是骑士精神都是讲慈悲的。

《三国演义》中，关羽率领精兵在狭窄的华容道截住了溃败的曹操，本来可以将其轻易俘获并带回大营领赏，但是看到对手狼狈的样子，他想起自己落魄时被曹操收留在大营、奉为上宾以礼相待的往事，慈悲之心战胜了责任感，念旧的他就让出通道放走了曹操。事后，他敢作敢当回营负荆请罪。结果，宽厚的诸葛亮也以仁慈之心原谅他的过错。他们都是真正的勇者，真正的绅士。

《九三年》中，雨果笔下那个百战百胜、身为富有领主的后代拥有爵位却效力于巴黎公社的革命者郭文，率兵前往西部省份旺岱重兵，却不肯攻击敌对阵营的女性，因为她们都是天生弱者需要呵护；他也不肯与敌对阵营的老弱病残者为敌，因为他们失去了抵抗能力；他还不肯伤害战场上敌对阵营的伤员，因为这些人没了武装已经倒在了战场。一句话，所有已经无法公平竞争的对手都要给予人道主义对待！

《九三年》的结尾令人震撼，大获全胜的年轻将领郭文在捕获叔爷后又将其放走了，自己为此上了断头台，以生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法国式“ 捉放曹 ”的原因是这位曾经残忍的叔爷甘愿冒着被俘的风险在熊熊大火中舍命救出了几个幼童。他们都是真正的骑士。

用雨果的话说就是：“ 在一个绝对正义的革命主义之上，有一个绝对正义的人道主义。 ”或许受到雨果大力渲染的人道主义精神所感染，几十年后在日内瓦，人类第一次以国际公约形式规定了交战双方不杀降，不虐俘，于是人类的慈悲和怜悯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相互敌对国家的集体首肯。

所以，慈悲是最重要的绅士风度，慈悲是最重要的骑士精神。

如果人人都讲慈悲，都有怜悯之心，社会就会安定，维稳就无需多少公共开支。如果人人不讲慈悲，社会就不能安定，无论花费多少公共开支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

前一段在厦门快速公交车上发生了一起自杀式纵火案，导致 40 多人丧生，加上伤者超过 80 多人，年近花甲的犯罪嫌疑人陈某也被当场烧死。在事后查获的遗书中，证实陈某因自感生活不如意，几十次向地方政府部门交涉社保问题无果，悲观厌世，进而泄愤纵火。

事件发生两天后，我在网上看到这样的评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辆被炸毁的公交车，很像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大家都在同一辆车里，如果一个人绝望，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安全。为此，永远不要对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因为谁也无法保证下一个不是你我。 ”

在这个吸引人的评论之后，网上没有太多对犯罪者的谩骂和教条式的说教，理性看待这个问题的评论占据了更多的版面，毕竟肇事者自己以生命相抵。我感受到了国人对这件事的思考。那就是不要漠视周围人的苦难，因为这是个在既无恐怖主义背景、生活环境又无恐怖主义的土壤下,一个失去希望的小人物绝命抗争的极端行为。我们如果将这个强大而繁荣世界的一部分、那怕仅仅是一点点分给他，也就不会将其逼到绝路。

在“ 9 · 11 ”恐怖袭击那天，我在几百米外看着世贸大厦这座象征强大美国的大楼在滚滚浓烟中像积木般轰然倒地，深深感到意志坚定的绝望者能造成多大的破坏。之后，我多次来回进出这个国家，又亲身经历过美国国土安全部以反恐名义对边境检查的严格程度，但是其境内的恐怖袭击仍然频频发生。

一个慈悲的社会能让任何一个阶层的人都有鞋穿，这样一来就没有光脚的，没有一无所有的人。按现在的语言说就是使改革开放的成果让社会所有人都能享受到。按照木桶原理来看，现在中国社会最大的短板就是贫富不均，我们一次分配造成的贫富差距，不能在二次分配时再扩大，只能将其缩小。共同富裕也是这个意思。

为富不仁是个短板，整个社会都向钱看是另一个短板，见死不救是个短板，被救后还反咬一口也是短板。想想看，我们小的时候曾经都有见义勇为做好事的冲动，只是苦于走在街上没有老者跌倒、行人受伤的事情在眼前发生，以便能有个受表扬的机会。现在我们碰到这种事却抱着绕道而行，抱着假装看不见的心态。

公平和正义的缺失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短板。要让这块短板加长，领导人要亲力亲为，行政机构要秉公执法、不能不作为，财富要向农村和弱势群体倾斜，整个社会都要学会变得慈悲，变得怜悯，变得有助人为乐的意愿。

别让短板葬送我们自己，别让短板葬送这个原本美好的社会。

随想录

孙中山的“ 知难行易 ”说

□张振飞

关于认识论中的“ 知 ”与“ 行 ”及其关系问题，其探讨古已有之，并且在不同时期具有与时代相符的特征和内容。中国哲学中的知行学说在世界哲学相关领域研究方面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自古以来关于知行学说的不断总结、提升又是中国思想家们为人类思想史所作的杰出贡献。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面对纷纷扰扰的时局，不约而同地将关乎着生活各个方面的知行问题视为亟需解决之根本。不难看出，大凡世道大乱，人们丧失对命运的确切把握能力时，知行问题的讨论便十分盛行。其根源在于认识论作为人存活的重要依据乃是给予人们存活之合理性以及生存道路以明示的重要命题。因此，认识论上关于知行关系的讨论是一个恒久不衰的话题。

孙中山的“ 知难行易 ”说在知行观的发展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辛亥革命后，饱经风霜的革命党人，眼看着民主的大旗弹痕累累而难以飘扬于中华大地，流血牺牲换来的竟是袁世凯投机篡夺政权、军阀混战不已。灰心丧气的革命党人开始对孙中山热切倡导的民主政治失去信心。“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的思想盛行于革命党内。畏于行之艰难而放弃民主政治之理想追求成为国情之大势。有鉴于此，孙中山疾首痛思，总结失败教训，意欲从理论上找到践行革命的强大武器，推翻国人畏于行艰而不行的思想，从而使众人再度齐心响应以建立民主共和之政府。

孙中山提出知行观的前提便是他的进化论思想。他依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提出社会进化的学说，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化的过程。而就中国而言，通过学习、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及政体模式，加之地大物博、人力丰富的优势和政局混乱的国情，革命建国定会以飞跃之速度完成，从而跻身强国之列。就变法而言，并非先知而不肯行，而是畏难而不敢行，所以人们才误认为知易行难的。由此，他寻根究源，找到国人畏难不行的根源，即“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的古说。针对此，他才提出了他的“ 知难行易 ”学说，以求从理论上维护其革命建国的设想。

孙中山首先以“ 行先知后 ”为其理论的起点和基石。他以维新变法为例，认为变法前很多人是并不知道西方政体思想的，而变法之后这一思想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他将“ 行 ”看成获得新知的必要途径，据此来驳倒“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说的基础——知先行后说，同时他还认为能够因此而推翻王阳明“ 致知而后物格 ”的“ 知行合一 ”说。他又提出了“ 以行求知，因知以进行 ”的知行相互结合的命题。“ 知 ”之难在于要经历毫无目的与方法的庞杂的行的积累，即要从万般复杂之中找出能够统一并指导行的知来，这必然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而确已有知后的“ 行 ”便会顺利展开，直至事功告成。

孙中山认为革命事业之成功、民主共和之实现、国家之由衰致盛，最重要的是要使国民知，既要知革命建国之可行，又要知世界之大势，更要知各种科学知识、术业专攻。只有国民了知这一切，加之“ 专门家 ”们的努力和杰出人物的领导，所有宏愿便能够计日以成。而孙中山所谓之“ 行 ”，除了古已有之的道德修养的内涵，更有生产活动、事业劳动等合乎时代特征的新内容。

但是在“ 知难行易 ”说的指导下，孙中山为其“ 知 ”之重要性竭力寻求根据，并试图以此建立其革命的领导地位，从而在其学说的理论效用下完成革命建国的事业。他得于斯而又败于斯。正是这种过于看重英雄人物的“ 天才论 ”与“ 群氓无知 ”的观点，导致了孙中山试图以天才人物的身份领导觉醒之士成就功业。这便如同放巨轮于陆地，失去依托之后便不足以显其功。

虽然孙中山的“ 知难行易 ”说未能如其所期冀的那样唤起民众跟随其共图革命以成改天换日之功，然而“ 知难行易 ”说对“ 知 ”与“ 行 ”内含的理解之突破和丰富是孙中山知行观的重要创新之处。这便能够解决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中人们所面临的对前途无望的困惑。历史也正是如此，至于以后民心日振，革命事业日益兴隆，此学说之功劳可谓大矣！孙中山也因其“ 知难行易 ”的知行观及其对时代和苍生的思想关照，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孙中山此说对于青年成长更是大有教益。世道虽安却有待更合理，生命虽健却担当众多责任。这一切都逼迫着青年们去考虑知行的内容和关系问题。可以说，树立明确的知行观乃是如何安置生命的必要准备。从孙中山的知行学说中我们可以明白：知，当全知，天文地理之术业、古往今来之历史、人情往故之世道无一不是知的内容；行，当多行，道德修养之崇高、圣贤学问之践履、洒扫应对之琐碎全都统归于行之科目。知行还应当缠绕和合，知以导行、行以得知，知乃是基于已有之识，更是在行之基础上获得。虽然青年于知行之获得，极不完备。而就事功论，必当以极少之知与极少之行始，在日益增益有足够知行之后才能圆满完成。生命因知而明亮，因行而广阔，于此明亮广阔之境，我们方才能少有困惑之煎熬、妄行之悔恨、失败之痛苦。

文化长廊

四千年前的英雄史诗

□王宏甲

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尚书》，已不是先秦时的规模，所见只是秦焚书后找回的残存篇章，其中还不免有断简破句。因年代久远，《尚书》在汉代已很考验读书人的读解能力。然而它的宝贵是无可取代的。

《尚书》之宝贵，还因它称得上恢宏。从洪荒初辟到筑城建国，从文字初见到有册有典，从胼手胝足拓土开疆，到土风歌谣入曲传唱，春秋运转中创造出青铜世界的鼎盛家乡，忽又战车隆隆，烽火烛天，血可漂橹……从尧舜禹到夏商周，生生灭灭多少迁变，一书在手尽成俯仰。

陶寺古城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城东北约 7 公里的陶寺乡，方圆包括陶寺、中梁等五个自然村，陶寺古城遗址的发掘，使我们读《尧典》获得立体印象。废墟下，埋藏着同我们今日血脉相系的创造。我们今天很重视科学，先夏时期的祖国，也是有当时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天文学就是最古老的科学之一。观天象以制历法，我们的先人因之得以大步迈进农业社会。陶瓦的发现，超越了“ 秦砖汉瓦 ”。红铜铃的出现，鸣响青铜时代的先声。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是在很早就克服了穷兵黩武。汉字“ 政 ”，从正从文，“ 治 ”是在治水中诞生的文字。所谓政治，最古老的含义就是用光明正大的文化治理社会。一把残破的陶壶送来一个“ 文 ”字，其更大的意义似不在于发现它早于殷商甲骨文，它更像是昭示着一种信仰。它告诉我们，崇尚文化而克服黩武，这中华文明的经典价值观，早在尧时代，就像旗帜那样鲜红地出现在这片土地上。若以为证据偶然，不够充分，再看看陶寺大墓中家猪之牙与 9 把玉钺的组合，分明在讲述着强军不战而能保卫国家的大智慧。龙形象为什么要设计在盘中？它圆圆融融地团在盘中的姿态，就是我们的祖先崇尚融合的伟大图腾。蟠龙口衔的一枚松枝，也分明寓意着天下为公。看看《尧典》中尧与四岳之长商议治水的情节，这里就是四千多年前那场大洪水中的抗洪救灾总指挥部。这尧都古城，华夏方舟，真真切切，可不是神话传说。事实上，治那场大洪水，最重要的方法不在于堵还是疏，而是要与各方国各部落人民相沟通，齐心合力，才可能共治洪水。夏，其实是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诸多部族民众联合起来，和衷共济，融合起来的民族共同体。再看看《尧典》里那些“ 平章百姓 ”“ 协和万邦 ”的记述，无论作为思想还是实践，都真实珍贵而殷切。再看古老的“ 堯 ”字，分明是在“ 兀 ”上垒土再垒土，筑造出高高的大城的形象。所谓“ 堯 ”，这个不同凡响的符号，就是这片土地的人民建筑起这座巨大古城的不朽的纪念碑。遥想四千多年前，必有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万民站在那高高的城墙上，举行庆祝这座城市建成的盛典。那时刻必有鼓角向着长天齐鸣，必有旌旗迎着长风飘扬，必有万民的欢呼浩荡。就在这里，在《尧典》里，在四千多年前尧时代的城邦建设中，有我们民族的英雄史诗。

我惭愧自己用文字难以描述，我期望有恢宏的影视作品来再现我们民族先夏时期的英雄史诗，让更多人能更容易感受到祖先的智慧对我们的照耀。所谓英雄史诗，并不是这里没有战争、没有黑暗，事实上这都城的后期就毁于残酷的战争，从尸骨的残骸中也能看到惊人的野蛮和黑暗，但废墟下面依然埋藏着曾经轰轰烈烈的崛起，埋藏着对和谐的追求。我也很期望，陶寺遗址上耸立起一座博物馆，让中华儿女永远观瞻。不要犹豫，不要等待。中华海内外儿女都需要它，一个民族接续起伟大的传统需要它。当历史的荒丘变成宛若万代母亲的乳房，万代子孙都能饱享到她的滋养。我期望有一天能走进这座再现祖先四千年前煌煌之创造的殿堂，让自己宛若孩童那样接受哺育……真的，追求平等、美好、自由、幸福，并不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的。没有哪一种伟大的理想不是很早以前就有先民憧憬过，没有哪一种生活智慧不是很早以前就有先民实践过。岁月走到今天，许多美好的、温暖的、珍贵的记忆，依然总是如微风如细雨如丽日保存在那些边远微末的地方。人类的生活，人生的尊严，精神的欣慰，常常总是被人类自己创造的物质、被金钱权力和欲望，吞噬得百孔千疮支离破碎。我怎能对《尧典》里就那么重视民生民意的殷殷描述无动于衷，怎能对尧都遗址里传递的文化追求无动于衷？

一篇《尧典》犹如此，况乎《尚书》。

我不禁想，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这部《尚书》，为什么能传下来？秦始皇为什么要焚灭它，甚至决心要把它从民间的言谈中记忆中彻底消灭？汉武帝又为什么同意把它列为五经之首，作为中央太学的教科书，用来培养大汉王朝的栋梁之才？一部《尚书》，自古数不清有多少读书人多少官员读它讨论它。愈在乱世，愈在权钱霸道官风世风颓败的年代，它愈显光华。为什么？不因书中多有帝王事迹皇室档案，而是那帝国倒塌政权兴替的鲜血教训越发育出了“ 民为贵 ”的思想。当代考古日益为我们打开缺乏文字记载的远古岁月，如陶寺遗址的发掘就使我们读《尧典》不止有典册说，还有古城说、废墟说……学会这样的凝听，对我们无疑是有好处的。